

# 論「推動兩岸文字統一工作」

熊自健

(本中心副研究員)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華民國國家統一委員會第六次全體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行政院落實國家統一綱領近程階段工作計劃三十八項，其中包括「推動兩岸文字統一工作」<sup>①</sup>。關於「推動兩岸文字統一工作」的具體方案現正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積極研討籌畫中，本文僅就此一問題提出個人的研究心得與建議，請各方批評指教。

## 一、中國歷史上的文字統一工作

中國文字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標誌着中國文明與其他文明不同的獨特性質，延續發展成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文字的起源究竟如何，至今仍是衆說紛紛，未成定論<sup>②</sup>。不過，中國有一個古老的傳說來形容創造漢字的驚天動地之舉，便是倉頡造字。古代文獻中有關倉頡的記載甚多，而荀子卻把此一傳說予以合理解釋，認為倉頡是中國古代文字的統一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荀子，解蔽篇）。也就是說中國文字非出於一時，成於一人，大家創造，大家使用，尚未定型，而倉頡把古代的文字加以正定，得到中國人民的接受，以致流傳至今。雖然荀子把倉頡看成是中國文字統一工作的完成者，但卻缺乏史料論證倉頡是如何進行文字統一工作，不能做為歷史經驗加以思考，吸取教訓。而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完成文字統一工作的歷史性成果，是秦始皇以小篆來「書同文」，以及漢朝隸書的通行；深入反省此二者的經驗與教訓，有助於正確地推動兩岸文字統一工作。

根據目前所發現的史料，中國在秦始皇「書同文」之前，有四種文字系統：(1)殷商系文字；(2)兩周系文字；(3)六國系文

①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年（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版。

② 參看，李孝定，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五年。

字；(4)秦系文字。殷商系以殷虛的龜甲獸骨刻辭為主，有銘詞的銅器次之，也就是俗稱的甲骨文。兩周系文字則以銅器銘詞為主，又稱為金文或大篆。六國系文字材料最繁褥，竹簡早已亡佚，現所存在的以銅器、陶器、貨布為主，有所謂「鳥蟲書」等。秦系文字大體承兩周，日趨整齊，最後形成小篆<sup>③</sup>。當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秦帝國之際必須解決中國混亂的文字局面，以文字統一奠定國家統一的基礎。「說文解字」序，明白的說明此一工作經緯及其意義：

「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sup>④</sup>

在這段著名的文字中，值得注意的有二：(1)「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合者」，這就以政治的力量，強迫性地要求中國人民以秦系文字爲準，形成正統文字。(2)「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省者省其繁重，也就是簡化，改者改其怪異，也就是正定，最後以「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三本標準小篆頒行天下，作爲標準字體，完成「書同文」，統一中國文字。

雖然秦始皇以政治的力量，並吸取文字簡化規律，集合一批才智之士制定一套標準的小篆完成文字統一工作，然而小篆的命運很快便趨於沒落。這固然是由於秦朝短命，漢朝取而代之，不繼續推動小篆做爲中國通行的文字；更重要的是，小篆雖然是取史籀大篆加以省改，仍不能「赴急應速，愛日省力」；隸書的興起，用更簡化的文字，應人民大眾的需要。「說文解字」序概括這一歷史經驗：

「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均有隸書，初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sup>⑤</sup>

「說文解字」把隸書的興起歸結爲處理日益繁忙的政治事務所需，其功用是「以趨簡易」，「赴急應速，愛日省力」；但對隸書的淵源，不像小篆那麼交代得一清二楚。段玉裁認爲「小篆既省改古文大篆，隸書又爲小篆之省」，把隸書淵源於小篆，加以省改而成。李孝定則認爲：隸書也是由秦始皇頒行，它與小篆是同時並行的。小篆是由當時正統派的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而成，而隸書則是出自春秋戰國以來民間所用通俗的文字，由程邈將其簡俗別異的形體，加以整理，擇其已爲大眾所接受的加以收集正定整理，奏請頒行；二者的形成，同出一源，不過一取正體，一取簡俗；但二者並行的結果，隸書因有民間多年來流俗通行的歷史背景，立佔上風，自秦至漢，除了少數銘之金石之廟謨典誥之類的文字，是採用篆文外，其他民

③ 參看，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台北學海出版社翻印，民國七十五年，頁三二—三六。

④ 許慎撰，段玉裁註，說文解字注，台北天工書局，民國七十六年，頁七五七—八。

⑤ 同上，頁七五八。

間通行，甚至士林傳習的，都是隸書，漢時的今文經便是一例<sup>⑥</sup>。根據李孝定的論點：小篆和隸書都是由大篆省改而來，都是由秦始皇頒佈實行，廟堂之上以小篆為正統，而民間卻盛行隸書，由於秦朝短命，致使小篆失去了政治的力量支撐而式微沒落，簡省方便的隸書就大行其道，成為中國通用的文字。到了漢初許慎做「說文解字」時已慨嘆當時人只知道隸書而不知有古文，發奮寫出一本以小篆為主體的古文字學研究，即「說文解字」，為中國第一本有系統的文字學著作，影響後世甚大，也保留下小篆等古文，使文化傳承得以延續發展。但隸書已成為中國通行的文字，無法回頭。

隸書經秦至西漢，兩百年間自然產生了許多簡俗錯別的異體字，東漢初年的馬援就曾上書指出官印上的文字有許多異體字，不能取信於民，必需正郡國印章。但當時漢室中興，百廢待舉，似乎無暇整理全部文字，領導階層也不重視正定文字工作；直到東漢末年才展開中國歷史上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字統一工作。「後漢書」「蔡邕傳」記載：

「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乃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sup>⑦</sup>。

這便是是用隸書寫成的熹平石經，其意義有：(1)以政治的力量統一文字，用標準的隸書體頒行天下，達成了正定文字之功，中國人民因此又一次書同文而得以順利溝通，政令有效地傳達於中國境內。(2)用當時的文字（隸書）來重新書寫標準本古籍，使古代的文化學術流傳下來，中國人民不會因不懂古文而不能學習古代的文化遺產。(3)我們從「乃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的盛況看來，人心嚮往經學與要求文字統一的心情是迫切的，要不是當時流行的簡俗文字與正定文字相去過遠，則建碑後觀視摹寫的，何至於如此轟動。

熹平石經以後，晉朝興起楷書，但楷書之於隸書只在用筆鋒書寫的方式有所不同，於字形卻無太多更動，不成為一種新體文字，唐朝開成石經，巴蜀廣政石經，北宋嘉祐石經，南宋紹興石經，清代乾隆石經，對於正定楷書都頗費苦心，也頗收實效。這些一次又一次進行的文字整理，只是將當時流行的紛亂歧異文字，加以正定，並不是由當時的政府另行製定一種他們認為更合適的新體加以頒行。因此我們可以說秦漢完成了中國文字統一工作，此後中國文字大致定型，隸楷書通行於中國境內，即使蒙滿異族統治中國也無力更改，中國文字屹立不搖。

## 二、文字改革運動與兩岸文字的歧異

<sup>⑥</sup> 同註<sup>②</sup>，頁八〇—一。



二九年瞿秋白在蘇聯草成「拉丁化中國文字」方案；一九三一年吳玉章在海參威舉行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一九三九年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公佈「拉丁化中國字運動新綱領草案」。在抗日戰爭與抗戰勝利後，中共忙於擴充實力與進行內戰，無暇處理文字改革問題。中共政權成立後毛澤東於一九五一年約集郭沫若等討論文字改革問題時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向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sup>⑨</sup>。但是「拼音化中國字」問題叢生，無法提出讓廣大中國人民接受的方案，中共才把文字改革的重點轉移到簡體字運動上，把簡體字當成拼音化中國字前奏曲。中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一九五五年一月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對於中共文字改革運動方向上的轉變有清楚的說明：

「語言文字是和人民生活習慣密切相關聯的，非拼音的漢字已經使用了幾千年，決不可能在極短時期內完全改成拼音文字。而且，即使在開始實行拼音文字之後，估計仍會有一個新舊文字使用的過渡時期，也就是說，不僅在目前，而且在今後的一定時期內，漢字仍然是我們必須使用的重要工具。因此，在拼音文字普遍使用之前，適當地簡化現在漢字，儘可削減其在教學、閱讀、書寫、和實用上的困難，仍然是有迫切需要的。」<sup>⑩</sup>

可見，中共仍以拼音化中國字為中國未來文字的理想型態，而簡化漢字不過是為了方便教學、閱讀、書寫，並做為過渡性的文字。然而當中共於一九五六年頒行「漢字簡化方案」後，在中國大陸印刷和書寫的文字一律採用簡體字，海峽兩岸的文字開始分歧。

中共頒行的「漢字簡化方案」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漢字簡化第一表，包括簡化漢字二三〇個，按注音字母音序排列，每個字附註原來的繁體字；第二部分為漢字簡化第二表，包括簡化漢字二八五個，排列方式如同第一表；第三部分為漢字偏旁簡化表，按原偏旁的筆畫簡繁排列先後，共五四個。簡化偏旁有×符號的，一般只作左偏旁用，沒有×符號的偏旁，不論在一個漢字的任何部位，一般都可以使用。簡化漢字第一表所列簡體字，從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起在中國大陸印刷和書寫的文件上一律通用，第二表和第三表則先行公布試用，徵求各方意見，在同年三月底前報中共「國務院」，以便根據多數意見再作某些必要的修正，然後正式推行<sup>⑪</sup>。「漢字簡化方案」推行後，中共鑑於對簡化偏旁的類推簡化字未能分批公布和認真推行，對其使用的範圍，交代得亦不夠明確，因而在教學上產生不少困難，在印刷上出現許多分歧，於是乃由中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編製「簡化字總表」，一九六四年公布實行。「簡化字總表」分成三個表，第一表收三三二個不作偏旁的簡化字；第二表收一三二個可作偏旁的簡化字和一四個簡化偏旁，第三表收應用第二表的簡化字和簡化偏旁作為偏旁得

⑨ 轉引自，汪學文，**中共文字改革之演變與結局**，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七十二年，頁七一。

⑩ 同上，頁一〇一。

⑪ 「國務院關於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收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全書**，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一九五八。

出來的簡化字，漢字總數很多，這個表不盡列。同時還加以註解，如「干」是「乾」的簡化字，但是「乾坤」的「乾」並不簡化。諸如此類可能發生疑難的地方，都加了腳註<sup>12</sup>。「簡化字總表」頒行後，中共完成文字改革的第一步。

一九七七年年底中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公布「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一九八六年中共「國務院」廢止此一草案，並指示：今後對漢字的簡化應持謹慎態度，使漢字的形體在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以利於社會應用。當前社會上濫用繁體字，亂造簡化字，隨便寫錯別字，這種用字混亂現象，應引起高度重視。有關部門應研究，製訂各方面用字管理辦法，逐步消除社會用字混亂的不正常現象<sup>13</sup>。同年十月中共「國務院」批准重新發表原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一九六四年編印的「簡化字總表」，規範中國大陸的文字，以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而重新發表的「簡化字總表」中也對原「簡化字總表」中的個別字，作了調整和說明<sup>14</sup>。至此，中共當局已坦白承認推行簡體字的成效不大，造成社會用字混亂局面，必須謹慎地推動漢字簡化。同時由於中共簡化字的原則不外錢玄同在一九二〇年所提出的八項構成方法，所造出的簡化字常不夠成熟，迫使中共當局必須一再調整修訂。簡體字運動已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重新認識漢語漢字以及各種新的文字改革方案，目前在中國大陸正熱烈研討中<sup>15</sup>。

當中共在中國大陸推行漢字簡化方案之際，台灣地區也掀起是否要頒行簡體字的爭議。羅家倫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發表主張簡體字標準化的建議，並已由教育部設立簡體字研究委員會，主持文字變革事宜。羅家倫的「簡體字運動」立即遭到強烈的反對，一九五四年二月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廖維藩等一百零六人提出「為制止毀滅中國文字破壞傳統文化危岌國家命脈特提議制定文字制定程序法以固國本案」，並集台專家學者通力反對簡體字運動，鞏固台灣地區至今仍舊維持漢朝以來的隸楷文字<sup>16</sup>。

### 三、兩岸文字統一的途徑

以上簡要地論述了中國文字的統一過程及其流變，得知秦朝統一天下建立新的帝國之際，必須面對混亂的六國文字系統

<sup>12</sup> 「簡化字總表說明」，收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全書》，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一九六三。

<sup>13</sup> 「國務院批轉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關於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和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請示的通知」，收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全書》，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一九八六。

<sup>14</sup> 「關於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的說明」，收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全書》，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一九八七。

<sup>15</sup> 參看，袁曉圓主編，重新認識漢語漢字，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sup>16</sup> 有關台灣地區簡體字問題的爭論，參看中國文字學會編，中國文字論集（上、下），台北中國文字學會出版，民國四十四年。

，秦以政治的力量集合一批才智之士，省改大篆做出標準小篆來進行文字統一工作，完成「書同文」。然而當秦朝很快滅亡時，小篆失去了政治力量的支持也就迅速的沒落，中國人民選擇了另外一套文字（隸楷）做為通行的文字。可見文字的流傳不決定於政治力量，而是文字本身的生命力決定其流傳與否。而當中國被西方文化以雷霆萬鈞之力打醒時，中國知識分子立即反省流傳兩千年的隸楷文字，深察其弊端，要求文字改革。在中國現代史上各種文字改革運動中，簡體字運動一直聲勢浩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一九三五年與一九五四年曾經考慮推行簡體字，但因反對力量強大，下令不必推行。中共則先偏愛拉丁化中國字運動，試圖把中國字改革為拼音文字系統，但因困難重重而做罷，轉而推行簡體字，做為文字改革的第一步，為過渡時期的文字。中共政權於一九五六年頒行「漢字簡化方案」，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維持漢朝以來的隸楷文字，從此海峽文字歧異。一九八六年中共坦承中國大陸推行簡體字遭遇危機，有濫用繁體字，亂造簡化字，隨便寫錯別字的文字混亂現象，要求謹慎地進行漢字簡化，規範中國大陸的簡體字。一九八七年中華民國政府開放大陸探親，進而進行文化交流。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隨著開放交流日益密切，而兩岸文字的歧異卻造成溝通交流的障礙，於是「推動兩岸文字統一工作」也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目前由於中共尚未實行拼音化中國字，只頒行簡體字，因此推動兩岸文字統一工作的重點在於如何處理簡體字問題。簡體字是中共政權以政治的力量強迫中國大陸人民接受的，並沒有歷史的必然性與迫切性。中共政權並沒有面臨秦統一天下時文字混亂的局面，必須另造新的文體來頒行中國大陸以統一混亂的文字，奠定國家統一的基礎。中共頒行簡體字的背後是西方文化的挑戰，現代化要求與「五四」反傳統文化潮流。在中共政權仍然存在，並以政治力量支持簡體字情況下，我們必須深入反省簡體字的功過，檢討簡體字是否有隸楷文字的功能，讓中國大陸人民普遍接受，如同隸楷文字取代小篆，成為中國通行的文字。它不以政治力量為轉移，而具有歷史的必然性，是中國人民約定俗成、自由選擇的結果。然而海峽兩岸的文字學家對於「簡體字」都有深入中肯的批評，限於篇幅，本文僅舉一位大陸學者對大陸簡體字的反省。

大陸學者王天指出：漢字簡化是中國文字發展的規律，並且必將是繼續按照這條規律簡化下去。漢字簡化應從幾個方面著眼：(1)多筆劃減為少筆劃的簡化，明確繁簡標準；(2)調整標音不準的假形聲字；(3)調整和減少部首，使部首均合其義，並成為萬物分類的標誌；(4)廢除異體字；(5)合併音同義近的字。但是簡化方案沒有作好。就筆劃而言，究竟多少筆為繁體，多少筆為簡體，沒有明確的繁簡標準，結果多筆劃字沒受到簡化，筆劃少些的卻大動手術。就簡化偏旁而言，只簡化偏旁而另一部分未全面徹底簡化，結果仍不能使整個字得到簡化，是不成功而且喪失漢字偏旁望文生義的特點。就形聲字而言，形聲構字易讀易識易記，科學性強，為後世人喜用，簡化漢字若充分採用形聲法，必會取得良好的成效。但簡化方案強調得不够，有相當多的字使用他音或近音取代聲音，造成誤讀，製造了讀音的混亂，如把「扰（擾）亂」唸成「尤」亂，把价（價）、让（讓）、进（進）、郇（鄰）讀白了音。漢字中有相當多標音不準的假形聲字，這些假形聲字正是改革的內容之一，

然而簡化方案卻製造了許多假形聲字，太不應該了。此外，簡化方案中許多字，用一個字符對若干不同讀音的字簡化，用作符號者既不表義，又不讀音，像一個填充物。例如用「又」字簡化了雞、轟、轟、觀、僅、鄧等字，這些字都不讀「又」音，也無「又」的含義，更不是偏旁，這樣簡化有何意義，孩子們學習起來個個死記，無法從「又」字聯想到讀音和字義，只不過省減若干劃，而喪失中國文字形音義結合的特色。就合併音同義近的字而言，漢字有許多音同意近的文字如「須、需」、「作、做」等字，很容易混淆用錯，應該合併，但簡化方案沒有這樣做，卻把音同義不同的字符合併不少，如「鬆、松」、「蛋、旦」等字。簡化方案硬把這些字強行合併，是不應該的，表面上減去一字，使用上卻複雜並造成歧義，這不是簡化是倒退。同時簡化方案把有些字簡化得不美，失去賞字的樂趣。如簡化方案中的「飛」字就不美，以局部代整體的方法簡化，少了六劃，字形簡潔但不美，右邊太重，而且飄起無限，左下方太空，整個字看來是翻滾欲跌之狀，給人不安。簡化漢字不能貪圖省幾筆就是目的，而要使簡化字簡而不陋，英姿矯健，人民才喜歡<sup>①⑦</sup>。

王天對中共頒行的「漢字簡化方案」與「簡體字總表」所提出深刻批評，是深受其害，痛定思痛的反思。可見雖然簡化是中國文字發展的規律，但改革漢字是一項長期、緩慢而且艱巨的工作，操之過急與權宜之計的態度是不對的。中共所頒行的「簡體字總表」是尚未成熟，經不起學術的推敲的產品，勢必被中國人民修正，以至於捨棄，是不能用做統一兩岸文字的標準字體的。而由海峽兩岸的文字學家，根據中國文字學原理共同商訂一套新的簡體字總表，以解決兩岸文字的歧異還不失一種「推動兩岸文字統一工作」的方案。但此一方案是長期的艱巨的工作，而且必須由兩岸人民進行、試用、選擇、淘汰，兩岸的政府只做推動與最後頒布的工作，而且不可預設立場與預期成功。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發現目前最穩當的統一兩岸文字方案，還是促使中共停止文字改革，恢復隸楷文字傳統。海峽兩岸的學者應向中共施壓，去引導中共當局認識中國文字的特性及其優點，明瞭文字改革的艱巨，不要拿不成熟的文字改革方案遺害中國文化的發展，阻礙海峽兩岸的統一。如果中共當局悔悟文字改革的不當與禍害，從而放棄簡體字以及其他的文字改革計劃，如拼音化中國字、拉丁化等，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應大力支持中共當局去教育十一億中國人民學習隸楷文字，出版隸楷文字書籍，進行文字統一工作。當全中國文字統一於傳統隸楷文字時，簡體字就將如同行書、草書的命運，流行於私下的信函與書記，並添加中國書法藝術的新頁。但是如果中共執意推動文字改革，甚至實行其拼音化中國字的迷夢<sup>①⑧</sup>，勢將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抗，兩岸的文字統一工作也將是遙遠而似乎不可能和平解決的大業。

①⑦ 王天，「漢字簡化褒貶談」，收編在袁曉圓主編，重新認識漢語漢字，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一二六—一三一。

①⑧ 關於中共推行拼音化中國文字的情況與問題，請參看，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三版。汪學文，中共文字改革之演變與結局，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七十二年。